

(美)克里斯多夫·拉斯奇 著

CHRISTOPHER
LASCH

自恋主义文化

陈红雯 吕明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CULTURE OF NARCISSISM



万物之灵丛书



912.4
L008

自恋主义文化

〔美〕克里斯多夫·拉斯奇 著
陈红雯 吕明 译

万物之灵丛书



10083109

上海文化出版社

SBL55/08

原著 1979 年由 W.W.Norton & Company, Inc. 初版。
本书据 1979 年初版的 Warner Books Edition 译出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周志武

自恋主义文化 [美] 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著
陈红雯 吕明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溧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95,000

1983 年 1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800 册

ISBN 7-80511-179-0/C·6

定价：2.80 元

编辑前言

人——这个称为万物之灵的生命物种，在地球上生成以来，繁衍生息已经几十万年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为了求得生存与进步，不断地改造着自然，变革着社会，创造着文明。纵观人类文明史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人类文明的每一成果，无不是人这一生命物种的杰作。面对“人化了的自然”，人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只有人才真正称得上是“万物之灵”。

人在探索与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关注与研究自身的内部世界。认识自己，寻找自己，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古老命题，刻在古罗马阿波罗神庙里的一句箴言就是：“认识你自己！”可是，人要认识“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啊！黑暗的中世纪不去说了，当时的人只是神的奴仆。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大贡献，是升起了人文主义的旗帜，重新发现了人。但人的本性、本质到底是什么，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更替，总会有新的发现。现代社会的进步，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进

一步觉醒。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热点，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为顺应这一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万物之灵丛书》，着重从文化与社会视角探索人、研究人，积累这方面的新成果，以有助于人了解人，认识人，提高人，完善人，并进而有助于人从“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逐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复归”。

《万物之灵丛书》包括国内学者的著作和翻译介绍国外学者的著作。国内著作的作者大多是中青年，他们思想活跃，勇于探索，论述都力求贴近现实，对人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探讨。当然这种探讨是“诸子百家”式的。译著则着重介绍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影响的国外研究专著，少量兼及在此以前的重要著作，以供借鉴。不论著作还是译作，文字一般在15万至20万字左右。我们注重的是书稿的学术质量，希冀的是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读者在阅读、了解和增进有关人的知识的同时，能够开拓视野、更新观念，提高境界，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8年1月

中译本序

那喀索斯(Narcissus)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美丽少年，因深深被自己的美貌所打动，竟把水中自己的倩影误认为仙女而投入水中，最后淹死在那里。仙女们赶来为那喀索斯送葬，却只在水中找到了一朵水仙花。从此，那喀索斯便成了水仙花的代名词，也成了那种过度自我欣赏而不能自拔的人的代名词。

希腊神话的时代虽早已逝去，然而正如本书作者克里斯多夫·拉斯奇所指出的那样，那喀索斯的幽灵不仅没有消散，而且自恋主义已经成了当代西方文化的中心性格与心理特征，正腐化着整个西方文明。克里斯多夫·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1932年出生于美国奥玛哈市，年轻时曾就读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拉斯奇的主要著作有：《自恋主义文化》(1979年)，《被围困着的家庭——无情世界中的避风港》(1979年)，《最小的自我——艰难时代中的心理生存》等。其中《自恋主义文化》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被美国学术界广泛誉为研究当代西方人心态的一部经典著作。在该书中，拉斯奇在通过对当代西方人的心理、家庭、性生活、教育、文学甚至体育这些纷繁杂沓的领域作了严厉而深刻的剖析后提出了这样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爱上了我们自己？是不是在追求自我满足时我们牺牲了我们的共同未来？我们是否正在疯狂地寻找“自我”、追求“性解放”的同时失去了亲密、欢乐与相互之爱？正如作者在该书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的那样：“此书要阐述的却是一种正在死亡的生活——一种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文化。正是这种腐朽颓败的文化把个人主义的逻辑引入了一场人人皆敌的混战，把对幸福的追求引入了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主义死胡同。”

该书于1979年间世后，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立刻成了全美国范围内的畅销书。一本社会心理学著作能成为全国的畅销书，在西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自恋主义文化》出版后，从美国先锋派文化的代言者《乡村之声》，一直到美国资产阶级传统保守势力的著名喉舌《纽约日报》与《华盛顿邮报》，都不约而同地给了它极高的评价。《时代周刊》称拉斯奇在该书中表现出了“令人生畏的理智认识力与道德感”，而《乡村之声》则作了这样的评论：“《自恋主义文化》的论证十分有力。它是描写一个并不怎么明智的时代的一部相当明智——虽然有些激烈——的著作。”

自恋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与病态心理，是个人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环境中充分发展后的最终结果。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个人主义曾作为一种旨在把个人从君权和神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争取个人自

由、反对封建国家与教会专制，反对旧家长制的统治以及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等方面，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在本世纪开始后，后工业社会中的一系列发展（工业机构与社会机构的官僚化、家庭再生产职能的社会化以及权威的崩溃等）使个人主义的思想在有了登峰造极的发展之后开始走向了它的反面。特别是由于对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思想的普遍曲解，那种把个人生活看成是来自过去并通向未来的历史长河中的一点的历史延续感渐渐消失了。个人与人类其他成员越来越处于一种隔离、对抗的状态之中。与此同时，对自我与享受的追求也开始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泥潭。焦虑的、自我关注的自恋性格逐渐地取代了弗洛伊德时代那种深受严厉的超我意识压抑的歇斯底里型的性格而成了当代西方心理病态的主要模式。

这一发展在 60 年代美国的“觉悟运动”中达到了高潮。所谓“觉悟运动”（Awareness Movement）发轫于美国 60 年代的校园学潮、反战斗争和其他的激进运动之中。当时越来越多的不满于资本主义现存体制的人开始意识到，西方社会“人的崩溃”以及如此深远的人性危机，决非仅仅是消极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而是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因此任何对当代社会与政治的深刻分析，都必须同时解释个人的精神成长与发展为什么竟会变得如此困难。于是有人指出，传统的激进运动的缺陷在于它一直忽视了个人的精神成长与文化的问题，仿佛个人的精神发展“等到革命胜利以后”就会自行解决似的。

精神现实与社会现实究竟孰先孰后，这在哲学上多少世纪来一直是一个如何认识人类意识的问题，而在政治上则是

一个什么才是人对人的压迫以及人类解放的真正含义的问题，这也是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最终冲突之所在。我们究竟是通过社会革命还是心理革命才能真正推翻作为人压迫人象征的君权？反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言人诺尔曼·O·布朗在给君权——即人对人的压迫——下定义时就毫不犹豫地宣称：

詹姆斯王在1603年说过：“‘上帝结合在一起的，任何人不得分开。’朕即是夫君，整个英岛则是朕的法定妻子。”生殖器象征的人物与受众处于交媾之中；它们一起行动，又同时分开……国王是政体的勃起……在丹尼尔书中，那10个触角就是10个国王；在柬埔寨，国都中心殿堂里供奉着的生殖器象征就代表着帝王。国王殿下就是男性生殖器的化身。^①

这一观点为六七十年代的所谓“内心革命”与“觉悟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在政治与经济领域里的社会革命并不能真正推翻“君权”的统治并消灭人类社会的异化现象，既然人们没有指望能在何任实质性方面改善生活，那么革命就是也只能是“通向自我”与“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了。由于自恋主义者无法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发生兴趣，以上的认识又使他们相信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自己在心理上达到自我完善：认识自己，“意识自己的感情”。

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自恋主义者的这场“心路历程”就

① 诺尔曼·O·布朗《爱之躯体》，兰登书屋出版社1966年版，132—133页。

——译者

失去了任何社会与政治内容而具有了精神治疗的性质。而拉斯奇对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在对当代西方心理结构作了独到的分析之后，提出了在当代西方社会里精神治疗已取代了宗教而成了人们供奉的神祇。人们不再追求个人的拯救与解放，更不用说重建逝去了的黄金时代了。人们追求的是个人的健康与安全感。心理治疗专家而非牧师成了20世纪“心理人”（Psychological Man）为心理安宁而进行的斗争中的主要同盟。

然而拉斯奇又指出，心理治疗是一种反宗教，因为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最超凡脱俗的宗教也都表达了社会平等的愿望以及以更早先的世代之间所具有的联系，而这些价值观的消失正是六七十年代自恋主义的心理特征。心理治疗之所以是一种反宗教，还因为“它对病人的目前需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即使当治疗学家谈到人对‘意义’和‘爱情’的需要时，也只是把它们简单地看成是对病人感情需要的满足。他们几乎从来不曾想到……鼓励人们让自己的需要和兴趣服从于其他人的需要和兴趣，服从于超越自己利益的事业或传统。自我牺牲或自我贬低意义上的‘爱’……对精神治疗学家敏感的神经说来是压抑而不可忍受的，是违背常识并有害于个人身心健康的。把人性从这些过时了的爱和职责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就成了后期弗洛伊德治疗学……的使命。对他们来说，心理健康就意味着打破一切禁忌，并让个人的任何一次冲动都得到立刻的满足”^①。

20世纪的西方男女关系及其性生活是这场“人人皆敌的

① 见本书第1章觉悟运动对个人的入侵。——译者

战争”的另一个绝好例证。从表面上来看，由于本世纪以来西方所谓“性解放”运动、堕胎的合法化以及避孕手段的推广，西方的男女们似乎能比以往更好地享受性生活的乐趣了。同时随着西方家庭的日益退缩，人们不再能通过他们的孩子过一种间接的生活，从而使夫妻之间对感情的需要又大大增加了。然而正象拉斯奇在本书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所论证的那样，家庭职能的社会化、及时行乐的个人主义心态、特别是自恋主义对西方男女关系的侵蚀，恰恰在使两性之间的关系日益演化成一场战争，使得对感情的逃避成了西方两性关系的心理特征。

拉斯奇认为女性的非神秘化是与性生活的非崇高化相辅相成的。自恋主义者以追求性欢乐为目的的性放纵态度，大大削弱了曾经把性与爱情、婚姻与生儿育女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一旦性爱的价值仅在于性欢乐，它也就失去了同过去及未来的关联，并不再能给人们带来持久的爱情。与此同时，因为人们已不再以“他的整个人格”来应付恋爱的结果，他们也就失去了要求他人作出类似承诺的权利了。就这样，专注的恋情让位给了自恋主义以性放纵为正常模式的性关系。

开始于本世纪初的西方女权运动在为争取妇女权利、反对男性沙文主义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然而由于这场运动也带上了我们时代的自恋主义特征，因此它不仅没有使西方的男男女女在一个更高、更平等的层次上取得新的和谐，而且反而加剧了两性之间的对立与战争。这不仅体现在男性对拉斯奇所谓“阉割男子的女性”的恐惧之中——因为这些男性自感无法满足解放型的女性对性欢乐和感情的要求——而且也体现在更激进的女权主义分子由于无法维持令人满意的男女关

系而干脆采取的男女分离主义主张以及对一个没有男性的乌托邦的幻想之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自恋主义者在寻找他们的“自我”与“个性”中倾注了全部心血，然而自恋主义却是对真正的自爱与真正的个性的反动。拉斯奇认为当然美国人不但没有能力去建设真正的共同生活，然而现代工业的聚合力量又瓦解了他们的“独处”。随着以直接的政治控制、独裁制的家庭制度、压抑的性道德、文学检查制度以及旧式资本家的工作观为代表的旧家长制统治逐渐崩溃，一种由国家、公司、专家特权阶层和大众传播媒介组成的新的家长制统治（new paternalism）已开始出现。它虽然更加间接、更加隐蔽，但它比它所取代了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统治更有效地控制着西方人们的工作生活以及闲暇生活。

拉斯奇认为家庭的再生产功能的社会化是产生新家长制统治的原因之一。在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已使家庭的生产功能社会化，而且还剥夺了许多从前由家庭执行的再生产的功能，如技能训练、道德教育以及性生活的指导，以及现在的西方父母在没有领有一定文凭的专家的指导与帮助下甚至无法抚养孩子。自助传统的丧失更加深了构成新的有效统治的依赖：个人对组织的依赖、公民对国家的依赖、工人对经理的依赖，以及平民百姓对“专家”的依赖。这种新的依赖关系通过现代学校、商业广告以及其他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介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我们认为学习西方文化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毋庸赘言，自恋主义是后工业时期西方文化的心理特征。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我国文化不断开放的今天，读一读《自恋

主义文化》，思考一下该书提出的那些重大问题，对我们民族文化在历史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思索是有相当裨益的。

本书的第1至第5章由陈红雯译，第6至第10章由吕明译。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罗鸣军同志的很多帮助，谨在此表示感谢。

译 者

1987年9月于杭州

前言

亨利·鲁斯把本世纪宣布为“美国的世纪”后仅过了25年，美国人的自信就已坠入谷底。不久前还梦想着称霸全球的人，现在却为统治一个纽约市而绝望至极。越南战争的惨败、经济的萧条以及日益迫近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在社会上层产生了十分悲观的情绪，继而又在人们对领袖人物的普遍不信任中传遍了整个社会。丧失信心的危机同样也折磨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欧洲，共产党力量的增强、法西斯运动的复苏、恐怖主义的兴起都从不同角度证实了现存政体的虚弱和现存传统的没落。即使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坚强堡垒的加拿大，也因魁北克的分裂主义运动而面临着危及本国生存的威胁。

这种全球性的不景气表明，问题不仅仅是美国已失去了勇气。资产阶级似乎在任何方面都已才尽智竭、心力交瘁，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面对以排山倒海之势威胁着它的那些困难。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反映着一个西方文化的更为普遍

的危机，这在人们对现代历史应该何去何从，或者说应该如何将它纳入理性的轨道而感到的普遍绝望中显示了出来。自由主义这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政治理论早就不能对由福利国家和多国公司组成的这个世界加以解释，而且也还没有任何新理论来取而代之。自由主义理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理智上说都已破产。这种理论培养出来的各门科学曾踌躇满志，自信能驱逐几世纪的黑暗，今天却不再能为它们立志阐明的现象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社会学不再试图构思出一套关于现代社会的普遍理论；学院派心理学也从弗洛伊德提出的挑战中退却，终日埋头于研究细枝末节。曾是如此不可一世的自然科学也急急宣布自己对社会问题并不能拿出什么灵丹妙药来。

在人文科学领域，道德腐败之盛使人们普遍同意，人性研究根本无助于理解现代社会。哲学家不再解释事物的本质，也不再自称能教导我们该如何生活。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再把文学看作对真实世界的再现，而是把它看作艺术家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历史学家承认“历史具有一种不相关性”，或者用大卫·多纳德的话来说，“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新世纪暗淡无光，一片荒凉。”因为人文科学总是严重依赖于历史研究，所以，这种科学的崩溃可以从对历史的不信任中找到尤为尖锐与深刻的例证。正是由于过去信任历史，使记录下来的公共事件都带上了一轮道德尊严、爱国主义和政治乐观的光环。过去史学家认为人可以从以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增长学识。现在未来既已显得曲折艰难、捉摸不定，那么过去就是对那些终生研究它的人来说也显得“不相关”了。多纳德写道：“富裕的时代结束了。美国的过去提供给我们的‘教诲’，今天看来

不但不切实际而且是危险的……或许，我最有用的职责就是把学生从历史魔法的约束下解救出来，帮助他们看清历史的不相关性……并提醒他们认清人类仅在多么有限的范围内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来自上层的观点——对未来彻底绝望的观点。这种观点现已被那些统治社会、左右公共舆论、监督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科学知识的人所广泛接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问一个普通人对其前途有何想法，我们可以得到大量的证据来证实现代世界没有任何前途；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它既证实这种悲观的印象又指出西方文明仍有可能产生出能超越这场危机的道德源泉。对当权者普遍的不信任使社会更难统治，而统治阶层一再抱怨，却不理解它自己对造成这种困难负有责任。然而同样是这种不信任却有可能使人们培养出自治能力，最终使当初导致了一个统治阶级产生的那种需要完全消失。那种被政治科学家视为选民无动于衷的态度实际上可能代表人们对当众撒谎已成为流行病和惯例的政治体制所持的一种十分健康的怀疑。不信任权威可以有助于减轻依赖权威的心理，因为权威会使人们的自治能力丧失。

现代官僚主义已蚕食了早先地方依靠自己采取行动的传统，而只有这种传统的复苏与发扬才有希望使一个道德社会从资本主义这堆残骸中萌生。上层统治阶级的无能为力迫使人民从下面寻求出路。对政府官僚机构的不信任也开始发展为对各种公司官僚机构，即对当今社会真正权力中心的不信任。在小城镇，在拥挤的城市居民区，甚至在郊区，人们开始试行小规模的合作，以对付政府及各种公司，捍卫自己的权利。被企业与政府首脑视为“逃离政治”的现象可以说明

公民越来越不愿意作为预先试行好的闹剧中的观众参加到这种政治制度中去。换言之，它可以表明人们并不是要逃避政治，而是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反叛。

在美国，新生活的迹象正在涌现，一言难尽。然而，此书要阐述的却是一种正在死亡的生活——一种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文化。正是这种腐朽颓败的文化把个人主义的逻辑引入了一场人人皆敌的混战，把对幸福的追求引入了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主义死胡同。自恋主义的生存策略打着把人们从以往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幌子得以抬头。它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并重新生产出它声称要加以批判的那种日趋没落的文明中的许多糟粕。文化激进主义成了时髦之举，而它于无意中给予现存制度的帮助又是如此有害，以至要对现代社会作出任何有深度的批判，就必须同时批判目前在激进主义旗帜的掩护下的许多勾当。

众多的事实表明政教分离的批评方法及早期马克思主义大部分批评方法对于现代社会已经过时。很多激进主义仍然把愤怒的矛头对准独裁的家庭制度、压抑的性道德、文学检查制度、工作道德观和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其他一些基础，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早已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削弱甚至破坏。这些激进分子看不到“独裁制度的性格”不再能代表经济人的原型，而经济人又已经为我们时代的心理人所替代。后者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最后产物。折磨新一代自恋主义者的不是内疚，而是一种焦虑。他并不企图让别人来承认自己存在的确凿无疑，而是苦于找到生活的意义。他已从过去的迷信中解放了出来，但却对自己现在的存在发生了怀疑。他表面上很松弛，宽容，对有关种族纯洁的教条不屑一顾，但与